

现代中国

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

XIANDAI ZHONGGUO
ZHUANJI XIEZUO DE LISHI YU XUSHI

叶志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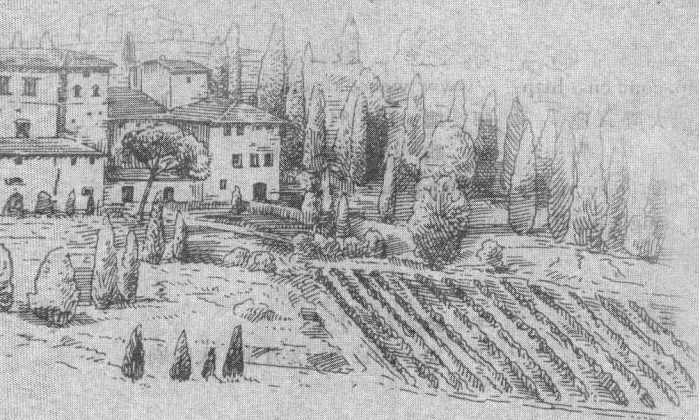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

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

MANDAI ZHONGGUO
ZHUANJI XIEZUO

SHI YU XUSHI

叶志良/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针对“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传记与传记类文学的创作现象,基于现代传记写作的研究,以传记的现代转型为起点,梳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各种传记的出现为研究对象,对传记文学和传记类文学进行了深入研析。在纵向上梳理“五四”以来中国传记与传记类文学写作的发展脉络;在横向上概括现代自传、他传、杂传、类自传和传记体小说的叙事方法与特征,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类自传、自传体文学现象进行学理式的探究与论述。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选修课程教材,也可供文学研究者、文学爱好者及一般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历史与叙事/叶志良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302-30931-4

I. ①现… II. ①叶… III. ①传记文学—创作方法—中国—现代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91669号

责任编辑:刘士平

封面设计:于晓丽

责任校对:袁芳

责任印制:宋林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装者: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2.75 字 数:215千字

版 次: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30.00元

产品编号:049925-01

目 录

绪言 “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基本特征	1
第一章 名人自传：名家创作与中国传记的现代转型	10
第一节 胡适《四十自述》：首开现代中国传记文学之先	11
一、现代传记观：“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11
二、《四十自述》：自古成功在尝试	14
第二节 全人格的袒露：郁达夫《日记九种》和《达夫自传》	16
一、郁达夫的传记文学理论	17
二、《日记九种》、《达夫自传》：“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	18
第三节 《沫若自传》：个体与历史的双重叙事	21
一、“活”人自述和“这一个”	22
二、纪实与虚构	24
三、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25
第四节 书信体传记：鲁迅、景宋的《两地书》	27
第五节 《从文自传》：“乡下人”的文体自觉	29
第六节 其他名人自传：现代传记写作热的兴起	31
第二章 现代他传：中国传记表现领域与方法的双向拓展	34
第一节 文人视野中的文人传记	34
一、郁达夫的中外文人传记	35
二、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李超传》	36
三、闻一多的《杜甫》	38
四、学术传记	39
第二节 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人物	39
一、吴晗的《朱元璋传》	39
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	41
第三节 英雄小品：为解放区英雄造像	44

一、革命领袖或高级将领传记	45
二、战时现实人物传写	46
三、普通人传记小品	49
第四节 呼唤英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雄叙事	50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	51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52
第五节 《雷锋传》：为真实而永恒的英雄立传	56
第六节 思想解放语境中的革命历史传记剧	59
一、革命历史传记剧的创作浪潮	60
二、艺术成就较高的革命历史传记剧	62
三、革命历史传记剧的意义	64
第三章 当代杂传：传记写作文体的泛化与主题弥散	66
第一节 那喀索斯的幽灵：明星自传的自恋倾向批判	67
一、明星自传的自恋倾向	68
二、明星自传的主要内容分析	70
三、明星自传的缺失	74
第二节 明星自传形式的多样呈现	77
一、叙述视角多角化	77
二、结构散文化	80
三、语言多样化	83
第三节 当代名人侧传中的父母形象	85
一、作为中心的父亲和作为陪衬的母亲：侧传中的性 差别主义	86
二、刚性的父亲和柔性的母亲：侧传中的性别刻板定型	90
三、苏格拉底式委曲求全的父亲和曹七巧式的破坏性母亲： 被误读和扭曲的形象	93
第四节 叶永烈《红色三部曲》对于文献的运用	97
一、文献，作为史传文学的历史佐证	98
二、文献，作为史传文学的情节元素	101
三、以文献为依托的书面对话	103
四、文献，作为主体内容的补充	105

第五节 《李敖回忆录》的地缘政治与人文表达	107
一、李敖的孤独与台湾的孤独	108
二、李敖的尖锐与台湾的尖锐	110
三、孤独与尖锐的必然联系	112
第四章 类自传：中国当代纪实性文学的突围表演	116
第一节 《我的人生笔记》：三位女作家同题“类自传”的叙事	117
一、零散叙事：“类自传”的“小型叙事”模式	117
二、情绪化：创作个体的体验式叙述	120
三、图文结合：“视觉史料”与文字的“缝合叙事”	122
第二节 自恋与抗争：《我与卡夫卡的爱情》中的个性化虹影	125
一、虹影的“自恋情结”	125
二、虹影的文本叙事角度	127
三、虹影的女性视角意义	129
第三节 林白《一个人的战争》的自传性	131
一、互文性：文本内容与作家生平的寓合	132
二、私人性：女性私人世界的呓语	134
三、身体性：确认女性身份和反抗男权的武器	137
四、真实性：实在与虚在的契约	140
第五章 自传体小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小说的传记式叙事	142
第一节 展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自传体小说叙事的基点	142
一、“经验自我”——故事的展示视角	143
二、故事的自我呈现——展示的自传性	145
三、故事的自我想象——展示的虚构性	148
第二节 叙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自传体小说叙事的深化	151
一、叙事人称之间的转换	151
二、视角的交替使用	157
三、对同一故事的多次展示	160
第三节 “展示”与“叙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女性自传体 小说的叙事	163
一、经验视角与叙事视角的统一	163

二、多种叙事人称的共存	166
三、个人化叙事与宏大叙事的遇合	168
第六章 小说传记：基于童年意绪的苏童小说的虚构叙事	172
第一节 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发生	172
一、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隐秘发现	173
二、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形成原因	175
第二节 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情绪表征	179
一、残酷：暴力和死亡的集结	180
二、冷漠：冰冷的惊惧	182
三、温情：瞬时的闪现	183
第三节 苏童小说童年意绪的文本表现	184
一、“香椿树街”系列：青涩的童年	185
二、“枫杨树村”系列：被褻渎的家史	187
三、其他系列：悲惨的世界	191
参考文献	195
后记	196

绪言

“五四”以来现代中国传记写作的基本特征

“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的现代传记写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来文化蜂拥而至,对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传记名作的译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的热门话题。类似在梁启超笔下仅仅以篇名出现的西方传记作品如普鲁塔克的《传记集》,则已以整体篇章的形式,出现在中国读者的视线里,遂使中国有志于传记创作的作家终获可直接取法的样板。尤其是对法国作家卢梭《忏悔录》的效仿,使得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和回忆录的创作出现了一个不小的创作高潮。一些作家还基于西方传记理论的译评,试图建立起中国式的现代传记理论,如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在理论领域均有所尝试与开拓。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和文化现代化,传记和其他文体创作一样,也彻底摆脱了传记的中国传统模式和文言文的书写方式,代之新的体式和白话文。新的平民化传主代替了古典的帝王将相,传记所表现的领域也有所开拓,涉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并开始注意探讨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以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传记创作,无论是注重表现自我的自传,还是日益走向丰富的他传,均以较为可观的数量和上乘的质量,使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创作逐步臻于繁荣。

在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这个概念的,是著名学者胡适。1914年9月,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就传记文学的体例、特点诸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这意味着现代传记与史传或一般纪传文字的疏离,而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从此,中国现代传记写作开始纳入文学的范畴里来。

一、自我立传

在西方国家,社会名流撰写自传或回忆录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自传早已

成为文学领域内一个极为发达的门类。但在中国,除一些以述志抒怀为主的短篇古代自传,一直少人问津这一文体的创作。“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大解放,自传便成了知识分子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自古以来,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的中国文坛,一改以往不直接谈论自己的习惯,开始大兴自传之风,一批以标举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作品争相涌现。例如,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庐隐的《庐隐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张资平的《资平自传》、许钦文的《钦文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巴金的《片断的回忆》、欧阳予倩的《自我演戏以来》、柳亚子的《五十七年》和《八年回忆》、邹韬奋的《经历》等,甚至连日记、书信乃至情书等自传性作品也盛极一时。较有影响的有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庐隐与李唯建的《云鸥情书集》、章衣萍的《倚枕日记》、鲁迅与景宋的《两地书》以及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等。显然,自传的大量涌现,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繁荣的最初表现。

这些作品,一方面处于“五四”文化大潮及“五四”影响下的文化空间;另一方面,在撰写自传的过程中,作者多深受西方传记文学的熏染,尤其是法国伟大的平民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自传《忏悔录》的影响。在《忏悔录》中,卢梭以惊世骇俗的胆量,真实地展现了“一个资产阶级个性的‘我’,有时像天空一样纯净高远,有时却像阴沟一般肮脏污秽的内心生活”。这对一直处于自我封闭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启示。出于对传记的革命性认识,中国现代传记作品也自然流露出强烈的自我表现色彩来。

1. 自我暴露

中国现代自传作者汲取了卢梭大胆暴露的勇气,在自传中毫不保留地揭示自我,袒露自己外在和内在的全部真实。这些人中,善于自叙传的郁达夫,无疑是这种精神倾向的代表。

郁达夫认为,写传记应该是自己全人格的袒露,“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① 郁达夫的自传作品正是本着这种作传原则来进行创作的。

郁达夫是出版日记的先驱,也是生前将自己的日记发表最多的一位。在《日

^① 郁达夫. 什么是传记文学. 郁达夫文集,第6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

记九种》中，郁达夫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情感的变迁、心理的创痕、爱情的波折乃至行为的颓放。他甚至毫不掩饰地记录了许多在当时虽盛行，却不可提到桌面上，更不可公布在文学中的行为，如酗酒、吸鸦片、出入烟花柳巷等。可以说，中国还没有一个作家能像他这样如此公开自己的私生活，把自己从内到外一览无余地暴露在公众面前。无怪乎，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卢梭”。郁达夫的个性也决定了他最可能对自己人性恶的一面做真实的挖掘。他既自尊又自卑，极易冲动。在传统文化氛围极浓的中国式人际关系中，这种气质注定要遭到挫折和打击。郁达夫从卢梭那里得到启示，就很自然地选择了“自我暴露”作为向虚伪社会、虚伪人性斗争的有力武器，“我若要辞绝虚伪的罪恶，我只好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① 他的自我暴露的确具有极大的攻击力，对深藏在千万年的背甲里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近乎狂怒了。对卢梭“自我暴露”和批判精神的吸取，使郁达夫的自传在中国现代传记文学中熠熠闪光。

2. 自我张扬

和卢梭一样，“五四”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力求形成一种迥异于传统的崭新人格：独立自主、强调个性差异性和特殊性的人格。与这一追求相适应，不少自传作者塑造了个性鲜明、独立不羁的自我形象。这类倾向的代表当属郭沫若。

郭沫若在不同时期陆续写下百万字的《沫若自传》。其最大长处在于充分展示了传记的个性气质，塑造了具体的、不可替代的自我形象：重情感甚于理性、易兴奋也易消沉、热情敏感而略显脆弱的扩张型天才知识分子。最能使郭沫若自我形象呼之欲出的，是他的自信气质。他声称：“在这部书里面具体地指出了一个人 *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处在社会变革的时候，他应该走的路。”^② 郭沫若的毫不自谦，让人耳目一新，“然而浮夸骄傲，我觉得，比沉着谦恭倒要好一点，我们的东方文化就是过于沉着谦恭了”。^③ 郭沫若不愿做凡夫俗子，信奉英雄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看重天才，渴望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天才性人物。这种追求完美的特点在自传中得到传神的表现。郭沫若另一种重要性格，是叛逆精神：对旧式教育制度的反叛，表现为逃学、喝酒、打架、罢课；对旧式婚姻的反抗，表现

① 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郁达夫文集，第7卷。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

② 郭沫若。沫若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04。

③ 郭沫若。沫若自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67。

为出走，并毅然与安娜恋爱、同居；1915年后的叛逆精神则表现为强烈的爱国热情……郭沫若在自传中尽情张扬自己的叛逆性格，从而使他的自传不仅清晰地实现了他的“自我”，而且也对中国社会束缚个性的旧传统、旧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和批判。

当然，郭沫若的自我张扬与泛神论有密切的关系。“我即是神”的泛神论气魄，使其个性意识不仅要求确立自我、肯定自我，更带有自我扩张、自我崇拜的性质。泛神论使郭沫若不仅专注于自我的独特性，而且使他不满足于实实在在的自我，把追求重心移到高于“实我”之上的理想自我，与社会、宇宙和自然合为一体的“大我”。在某种程度上言，郭沫若的崇拜自我，是崇拜神化了的“我”，而不是具体实在的“我”。这种倾向是郭沫若能够得心应手地继承卢梭的自我崇拜，而在自我中将个性张扬到极点的重要原因，也是其自传魅力的主要源泉。

3. 自我剖析

卢梭善用人性原则对自己一生进行深刻剖析。可以说，卢梭在《忏悔录》中精细的分析、深入的挖掘、无情的审视和严格的自责，给中国现代作家以极大的心灵震颤。一部分人从他那里汲取了勇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灵魂思想进行审问、评判。他们在自传中对自我进行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无情的否定，以达到认识自己、净化自己，最终超越自己的目的。瞿秋白就是这一类自传作者中的范例。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于1935年5月22日在福建汀州监狱中写下的自传性遗言。作者以理性的手术刀，深刻细致地剖析了自己的灵魂，挖掘自身的矛盾以及矛盾的根源。瞿秋白无情地分析了自己对政治兴趣的薄弱和这方面工作能力的不足。他首先找出了令他困窘终身而无法摆脱的最大矛盾——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瞿秋白及大多数文人的性格。他以辩才著称，然而却揭示出这种表象下自己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以及“承认自己错误”的勇气。瞿秋白指出，他一生都在“扮演一定的角色”，而这种结果是既无益于他的政治工作，也耽误他的文学事业。自传还披露了他自身的另一重要矛盾——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其他异己意识的矛盾。瞿秋白是最早译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之一，但他自认为只是“一知半解”地“知道一点皮毛”。同时，瞿秋白出生于书香世家，后来又一直处于领导层，缺乏直接的革命实践，所以始终没有除尽自身的绅士阶级积习。文人、绅士的意识、情感，在他身上还根植很深。瞿秋白一生都处在既信奉马克思主义，又始终无法克服根深蒂固的其他异己意识的矛盾之中，进而感到异常疲惫。他只能空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无力彻底改

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严酷无情地剖析了一生中最大的过失和教训。瞿秋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其自我剖析坦率、真诚,又清醒、冷静,具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铁窗底下同世界的谈判,风格深沉、哀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为他人立传

为他人立传,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内容。落入人们视野并引起注意的,往往是继承古典行状传统的回忆性作品。例如,20世纪30年代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忆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我的第一个师傅》等名篇,选择典型片断,以省俭的笔墨,勾画出师友的神貌。鲁迅先生逝世后,各报刊争先辟出“纪念鲁迅先生专辑”,与鲁迅有过交往的诸多人士,纷纷著文纪念这位文坛巨星,从各个方面追述先生的嘉言懿行以及生活琐事,把先生的高风亮节、精神风采留诸纸上。综合起来,不啻是一部丰富的“鲁迅传”。另外,如纪念章太炎、庐隐、刘半农、徐志摩、梁遇春的作品,哀悼亲人故旧的作品,追忆青少年生活的作品,都属于回忆悼亡类作品。然而,现代人物他传并非限于片断、零碎的记述性回忆文。从某种意义上言,这只是现代传记的一个分类。“五四”以后的人物他传,主要是在文人传记、历史人物传记上显示其丰富内涵。

1. 文人传记

现代传记创作,往往择取那些在中外文化发展中做出一定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作为现代传记的传主,从而使文人传记声名鹊起。

郁达夫曾为中外文化史上的许多文人写过传记,有的是全面介绍传主生平和著作,有的是择定传主生活中的几个片断,有的是突出传主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等。曾被郁达夫作为传主的,外国文人有施笃姆、赫尔岑、须的儿纳(今译卡尔巴尔·施米特)、托尔斯泰、尼采、卢骚(今译卢梭)、萧伯纳、屠格涅夫、查尔·劳伦斯等;中国文人有郭沫若、鲁迅、成仿吾、徐志摩、刘开渠、曾孟朴、王二南、徐悲鸿、刘海粟、许地山、胡适、黄仲则等。郁达夫似乎对卢梭情有独钟,仅在1928年1月就写有《卢梭传》、《卢梭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洋洋万计的传记文。该传记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记述了卢梭的生平事迹。从盛赞卢梭落笔,然后详尽记述了他的家庭出身、童年生活、流浪经历、初恋、与伐兰夫人的纠葛、与政敌的较量、成

名、因迫害所致精神病突发而去世等经历,作者优美而传神的笔墨,与传主本身所独具的浪漫传奇色彩,共同塑造出一个集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卑鄙、伟大与渺小于一身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郁达夫的文人传记带有其明显的情绪色彩,极富文学意味。

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则是一部富于史料价值的、客观化的人物传记。传主丁文江,是现代著名的地质学家,也是胡适的挚友。胡适称丁文江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该传记基本上是按年代顺序,记述传主一生中几个重要的阶段,既写出了丁文江献身科学的精神和他对中国地质科学所做的重要贡献,又写出了丁文江“捧出心肝待朋友”的处世美德,也写出了丁文江矛盾的政治观点。胡适对亡友的感情十分真挚,收集了相当丰富和完备的材料,如丁文江的文章、信件、作品以及有关他的资料,进行剪裁和组织,虽材料罗织仍塑造了丁文江这一有个性的地质科学家形象。

2. 历史人物传记

曾在中国历史某些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帝王将相式历史人物,也经常作为现代传记的对象,以期在历史人物中获取当今社会所需的意义。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传记中,有两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即历史学家从自身观点出发撰写的《朱元璋传》和《张居正大传》。直到今日,这两部作品仍位列中国历史传记的榜首。明史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叙述了明朝第一位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一生。作者着力刻画了朱元璋由出身贫贱的下人参加农民起义,从普遍士兵一步一步爬上权力的顶峰,成为庞大帝国最高统治者的经历,十分注意对朱元璋性格的塑造。吴晗对朱元璋有过这样的评价:“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中华民族自主的大帝国,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他被后代人称为‘民族英雄’,也是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显然,这部以朱元璋政治活动为基本线索的历史传记,并非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活动的角度着眼,而是有意识地使之服从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旨在政治批判。恰如朱东润谈到的那样“政治味特别浓重,我读过的第一句话是‘这是蒋介石论’”^①,政治影射昭然若揭。《朱元璋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共有 500 多个注释,且正史和野史

^① 朱东润。我学习传记文学的开始。

共存,互相辩证,几乎每一段之后均有一个注释说明资料来源,“做到无一事无出处的地步”。一直到今天,仍以其学术、史学成就而备受重视。

与《朱元璋传》所不同的,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为的是寻找政治理想。在朱东润的笔下,一度遭人误解的张居正是个理想的政治家,“他底志愿是把整个的生命贡献给国家”。在他的治理下,“整个国家安定了,政治上了轨道,经济有了把握,太仓粟支十年,太仆寺积金四百余万;北边的俺答屈服了,土蛮虽没有屈服,但是不断地溃败,解除了东北方的威胁;内阁的里面,安定到没有一点波浪”。此传作于抗战时期,其现实意义不言自明。朱东润很注意传记的学术性,传记中内容大抵都有史实依据。作者在《序》中也称“我担保没有一句凭空想象的话”,即便是人物对话,也大抵出之有据。在具体的表述形式上,又相当突出其美学技巧因素,在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描述事件、刻画人物等各个方面,大都吸收和借鉴了文学方法。该书虽为历史人物立传,内容中也多有令人陈旧的东西,但借助文学笔法,整部作品摆脱了史学著作的枯燥感,获得了审美层面的永恒。

3. 当代人物传

大量的当代人物专访和人物速写的出现,为当代英雄立传,也是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趋势。

显然,这是新闻文体与传记文学发生密切关系后的产物。它具备传记文学的基本要素,只是对于传主生平事迹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反映,并且以当前事实为重点。换言之,不少兼有新闻记者职业的作家也都习惯以某种新闻文体来写传记作品。例如,刘白羽等作的《八路军七将领》(其中《任弼时》、《彭德怀》、《彭雪枫》、《萧克》为刘白羽所作),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丘东平的《叶挺印象记》,沙汀的《随军散记》,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中的《徐海东将军》与《聂荣臻同志》,何其芳的《记冼星海同志》、《记王震将军》、《记贺龙将军》,丁玲的《彭德怀速写》,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杨朔的《毛泽东特写》,赵超构的《毛泽东先生访问记》,黄既的《关向应同志在病中》等,皆是为活人立传、较有影响的作品。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即《我所见之H将军》),以人物为本位,由人物派生引发出故事,在故事的开展中,调动一切文学手法去描绘、刻画人物,展现人物的性格,是抗战时期不可多得的伟人传记。作品中纷繁的故事是由贺龙将军经历生发开去,反过来这些故事又充分表现了贺龙的性格。这样,一个驰骋战场的豪情英雄就生动地凸显出来了。

三、现代传记的灵魂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传记文学，无论是自传还是他传，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对传记作品主题、价值的重视，看重的是传记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是现代传记得以存在和流传的灵魂。

显然，“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文学，契合“五四”的时代精神，重在对“个人主体”的建构，对新的个性的张扬。这种传记往往从“五四”开始倡导的现代科学、理性的启蒙主义价值观出发，力图以不同于传统的传记观点和立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反思，以此达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所要求“人的解放”的目标。这类传记力图对传主个人经历进行思考、追问，重塑中国人的人性意识，批判传统封建文化的压抑性，寻找新的人性意识的生长点。胡适的《李超传》及《丁文江的传记》，就非常明确地表现出这种意识。《李超传》是为一位无名女青年立传。该传刻画了一位背叛封建家庭、外出求学，但因受旧家庭经济、伦理等的多重压迫，最终郁郁而死的20世纪初失败的中国“娜拉”。全文大量引证李超与亲属的通信，勾画出这个普通女性平淡无奇的一生。但正是这位普通女性的一生，却映照出了传统社会对个人的无情压抑，“因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无量数中国女子的写照……可以算做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基于对这种“个人主体”遭受压抑状况的批判性思考，使胡适提出了一种新的传记美学的选择，“我觉得替这一个女子做传比什么督军做墓志铭重要得多咧。”^①《丁文江的传记》则塑造了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人的成长。胡适的这两部传记，一篇是对被压抑、被损害人性的深切同情，一篇是对理想人性的写照，最终归于一题的，无疑是对“个人主体”与个性独立的肯定。

实际上，对个性、人格的肯定和张扬，一直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包括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潮流。像沈从文的《记胡也频》、《记丁玲》等，也一样寄托他对现代个体建构之实现的呼声。这些传记可用沈从文在《记丁玲》一文《跋》中的一句话来加以概括：“我所记下的，只多就我所知道的这个人的生活而言，虽不一定是最光辉的一面，却实在是最人性的一面。”这种对于传主“最人性的一面”的发掘，一直成为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主流。

“五四”以后的现代传记，还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群体需要出发，寻找足

^① 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以凝聚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典型人物,把他们看做是“民族国家”这一群体的精神象征。这些人物或可作为中国思想与精神的源泉,或以其行动或思想为建构新中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或以道德或情操的高尚性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这些人物不再是传统社会的忠臣良将,他们认同的“国”亦非传统概念所能包容的。正如有分析传统的“国朝之国”与现代的“民族之国”的区别时所明确的:“国朝之国本植于帝室,求姓之绵延;民族之国本植于人民,求全民之荣华。同谓之国,固有异趣存焉。”^①这一“求全民之荣华”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便成为现代传记创作的前提和条件。这种传记,一方面包括类似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韩愈》、《孔子的故事》等对古代人物的重新阐释和理解,出新意而为当前社会需要服务的作品;另一方面则是对当前社会所出现英雄人物的发现,如丁玲的《彭德怀速写》、沙汀的《随军散记》以及对毛泽东、朱德、关向应、白求恩、陈赓、任弼时等伟人的立传。显见,这些人物都是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而出现的。即便是抗日战争和斗争第一线中涌现出来的工农兵知识分子、先进模范人物为传主的作品,如丁玲的《民间艺人李卜》、陈荒煤的《一个农民的道路》、杨林的《小翠也自由了》等,也均以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感情,丰富了此类创作。显然,传主的个人经历与民族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不仅仅是作为个体存在,而且更是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人们产生“认同”意识的对象,即楷模。

不难发现,“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一直是在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的双重追寻中求得发展的。这些传记的共同目标就是现代“理想人格”的建构,而这一“理想人格”正是中国现代“启蒙与救亡”工程中最关键的环节。这种以“立人”为中心观念的“伟大叙事”,一直支配着现代传记的写作。

^① 汪荣祖,《史传通说》,北京:中华书局,1989。

第一章

名人自传：名家创作与中国传记的现代转型

“五四”以来的现代传记观念，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熏染中诞生、成长起来的。进入 20 世纪以后，在中国较早接受外来影响的作家、学者中，开始有人对“传记”进行反思和新的学术审视。梁启超就是 20 世纪之初关注此领域的知名人物。他提出了“以人为本位”的传记思想，并对人物传记的诸般形式、主要原则做了阐释^①，为现代传记的创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囿于诸多原因，最终仍未脱旧史学的痕迹。其后，更有学者投身传记创作，探讨传记的理论建设，提出了种种传记理论的构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性的张扬、对封建旧意识的否定，带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性的一次大解放。在中国一向被冷落的自传，便成为人们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一种最方便有效的形式。自古以来对自己私生活讳莫如深的中国文坛，此时大兴自传之风，一大批以标举表现自我、张扬自我为上的自传作品争相涌现，如胡适的《四十自述》、庐隐的《庐隐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张资平的《资平自传》、许钦文的《钦文自传》、郁达夫的《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谢冰莹的《女兵自传》、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白薇的《悲剧生涯》、巴金的《片断的回忆》……甚至连日记、书信乃至情书等自传性作品，也出现在创作的舞台上。著名的有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庐隐、李唯建合作的《云鸥情书集》，章衣萍的《倚枕日记》，鲁迅、许广平（景宋）的《两地书》以及徐志摩的《爱眉小札》等。显然，自传的大量涌现，成为“五四”以来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也成为中国传记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最早进行自传创作且在传记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卓有建树的，自然是一些知

^①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